

李商隐诗集今注

◆ 郑在瀛

武汉大学出版社

李商隐特集今注



● 郑在瀛 ● 武汉大学出版社

量宽卷页强，页静，页疑奇破，中国韵诗美雅凡，甲器器不，奇况以张
，新图系短门暗着群并图世世己解，香露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商隐诗集今注/郑在瀛. —武汉: 武汉大学出版社, 2001. 8
ISBN 7-307-03127-2

I. 李… II. 郑… III. 古典诗歌—注释—中国—唐代 IV.
I222.7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54954 号

责任编辑: 陶佳珞 责任校对: 刘凤霞 版式设计: 支 笛

出版: 武汉大学出版社 (430072 武昌 珞珈山)

(电子邮件: wdp4@whu.edu.cn 网址: www.wdp.whu.edu.cn)

发行: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

印刷: 湖北省通山县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24.875 字数: 643千字 插页: 2

版次: 2001年8月第1版 2001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307-03127-2/I·238 定价: 31.00元

版权所有, 不得翻印; 凡购买我社的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质量问题者,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。

前 言

燕台不碍五湖居，自趁黄昏好著书。
玉管葭灰吹细缕，云笺风纸写崎岖。
刘楨谢疾真无累①，虞寄辞归更有娱②。
报与遗山休惋恨③，樊南蚌病许还珠④。

——病退撰《李商隐诗集今注》感怀

李商隐的名字同他的绝妙好诗早已进入千家万户。即使读书不多的人，对于“昨夜星辰昨夜风”、“心有灵犀一点通”、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”、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这一类感人肺腑、动人心魄的诗句，也能随口道出。随着新世纪的到来，人类将获得更多的自由，人性将得到进一步解放，人的各种隐情、各种奥秘以及难以言说的感觉，将以多样化的方式和手段大胆地表露于外，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的广泛和深入，将远

① 刘楨为曹操记室，卧病清漳之滨。

② 虞寄，南朝梁陈时人，居官不满秩，自求解退。

③ 元遗山《论诗》：“诗家总爱西昆好，独恨无人作郑笺。”

④ 商隐自号樊南生、玉溪生。《文心雕龙·才略》：“显志自序，亦蚌病成珠矣。”

远地超过往代。正是在这种新的情况下，李商隐的那些以“隐僻”著称的、以描写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细腻曲折的爱情心理为最大特色的诗歌，重新展现在我们面前，难道不像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心理研究一样产生轰动效应？难道不被更多的读者理解和接受而愈来愈受到世人的喜爱？

但是，李商隐的诗是不好懂的，解释起来很困难，元好问早有“诗家总爱西昆好，独恨无人作郑笺”的慨叹。梁启超在《中国韵文内所表现的情感》一文中写道：“义山的《锦瑟》、《碧城》与《圣女祠》等诗，讲的是什么事，我理会不着，拆开一句一句叫我解释，我连文义也解不出来。但我觉得它美，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一种新鲜的愉快。须知美是多方面的，美是含有神秘性的，我们若还承认美的价值，对于此种文字，便不容轻轻抹煞。”美和神秘是李商隐诗歌的主要特点，如同《蒙娜·丽莎》画像那样以其表现出丰富的内心世界而令人神往。越是神秘，越是令人想探求出究竟。《四库提要》说李商隐诗旧有刘克、张文亮二家注本，后俱不传。明末释道源的注本也不复存在，其一部分内容保存在朱鹤龄的《李义山诗注》三卷中。至乾隆二十八年，冯浩完成《玉溪生诗笺注》，对朱鹤龄、徐湛园、程梦星、姚培谦、屈复等人的注释评点作了总结，尤其对李商隐生平事迹的考订远胜诸人，似乎玉溪生诗的谜底已全部揭开。尔后张采田的《玉溪生年谱会笺》对冯浩的某些错误作了纠正，岑仲勉又以三万言的《平质》指出张氏的瑕疵。至20世纪80年代，有叶葱奇的《李商隐诗集疏注》问世，而刘学锴、余恕诚在出版《李商隐诗选》之后，又贡献出逾百万言的《李商隐诗歌集解》，还有杨柳的《李商隐评传》、吴调公的《李商隐研究》、周振甫在《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》中所写的《李商隐》以及众多专家学者所发表的论文，真是盛况空前。20世纪80年代是李商隐研究最辉煌的十年。尤其是刘、余的《集解》和杨柳的《评传》费力最大，成就显著。章学诚说：“天下

有比次之书，有独断之学，有考索之功。”《集解》长于比次，它将古代和现当代有关李商隐诗歌的注、笺、评点以及重要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完备地逐条胪列出来，并且指出其中的谬误，给读者和研究者提供极大方便，省其搜讨之劳也。而每篇之末的按语既融入了不少高见卓识，同时也颇多创获。杨柳的《评传》对李商隐生平事迹的考索非常仔细，特别是对其前期的成长和后期的行踪考察周详，是研究李商隐的重要依据。

在肯定清初以来众多专家学者对李商隐及其诗歌的研究成就的同时，不能不指出，还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没有解决。也就是说，在李商隐生平事迹研究上、在对李商隐现存的六百余首诗歌的阐释上，还有不少的问题没有弄清楚，更有不少的解释是错误的。有些是朱鹤龄、冯浩说错了的，后人也跟着错；有些是朱、冯说对了的，后人反而说错了。对于读者来说，重视诗歌的解释，尤甚于诗人生平事迹的考订，虽然二者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。冯浩在《玉溪生诗笺注发凡》第七条中说：“笺者表也，注者著也，义本同归。今乃以征典为注，达意为笺，聊从俗见耳。”这是说，注不过将所用典故一一著明，笺则须说明作品的现实意义及作者所处环境与故事如何。其第八条说：“说诗最忌穿凿，然独不曰以意逆志乎？今以知人论世之法，求之言外隐衷，大堪领悟，似凿而非凿也。如《无题》诸什，余深病前人动指令狐，初稿尽为翻驳。及审定行年，细探心曲，乃知屡启陈情之时，无非借艳情以寄慨。盖义山初心依恃，惟在彭阳，其后郎君久持政柄，舍此旧好，更何求援？所谓‘何处哀筝随急管’者，已揭其专一之苦衷矣。今一一诠解，反浮于（超过）前人之所指，固非敢稍为附会也。”冯浩的笺，原本打算脱离前人“动指令狐”的老路，另辟蹊径；经过一番“审定”、“细探”之后，反而超出前人之“动指令狐”了。封建时代，谁不把政治关系看得比其他一切关系更为重要？只有君王，哪有自己？只有朝廷，哪个人？只考虑如何当好统治集团的工具，哪里会想

到作为有血有肉有性灵的人的基本要求？难怪冯浩坚信义山“借艳情以寄慨”，欲与令狐郎君重修旧好，以求援引。冯浩是古人，可以谅解他。奇怪的是当代学者之相信旧说，更浮于冯浩。无征不信，试举例言之。《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》中有《李商隐》，传曰：“（李商隐）到了巴西，考虑到杜惊不会用他，决计北归，想向令狐绹陈情，他在巴西写了《夜雨寄北》……”又曰：“《无题四首》或是入京未补太学博士时写的，第四首说‘东家老女嫁不售’点明题旨。当时他借住在令狐绹家里，第一首说令狐不来，五更上朝前派人催商隐有所书写。金翡翠指住处陈设华丽。蓬山指翰林院，恨己不能进入翰林院。次首轻雷指令狐车声归来。虽金蟾衔锁，亦将烧香透入，正写迫切陈情。贾氏爱少年，宓妃爱才华，说明己非其人，己不为所爱，相思只成灰而已。见得令狐不肯汲引。又《无题》（相见时难别亦难）末联说蓬山近，指离翰林院不远，希望令狐绹推荐。虽他已很难相见，但缠绵之情，到死方了。”又曰：“他去东川前，跟令狐绹告别，住在令狐家，又写了《无题二首》（凤尾香罗薄几重；重帷深下莫愁堂）。首言‘车走雷声’，是令狐归而不得见，直到烛暗不来，只能跟柳仲郢去西南。次言不寐凝思，空斋无侣。难禁风波，谁赏桂香。虽相思无益，终抱痴情。在临走时，还在想令狐的援引，希望进入翰林院。”如此郢书燕说、想入非非者，大有人在。试问读者诸君，李义山巴结令狐绹竟然到了“春蚕到死”、“蜡炬成灰”的地步，在令狐绹面前表现出如此臣妾气态，猥贱不堪，你们作何感想？有谁瞧得起他？王茂元会招他做贵婿？郑亚会请他掌书记并且为李德裕的《会昌一品集》撰写序文？卢弘止会聘他做判官并且兼侍御史的六品官衔？柳仲郢会聘他为节度使书记、判官并且加检校工部郎中的五品官衔？还有从前郑州刺史萧浣的爱接，华州刺史崔戎的培植等等，难道他们都是“有眼无珠”错看了人？要知道，注解李义山诗歌的谬误，远不止上述《李商隐》传中所举那些例子，因为《无题》诗虽是义

山诗歌中的极品，但毕竟数量少，不占其全诗的十分之一。问题还出现在那些有题诗上。比如《玉山》以玉山比秘书省吗？“神仙才子”指令狐绹吗？《镜槛》中的镜槛是“锦棚之属”吗？“月中”二句是“想象其闲居无聊”吗？“玉集”二句“不甚可解”吗？《灵仙阁晚眺》中“华莲”二句是“兼寓韦（评事）之人幕与才美”吗？《到秋》可以“解为义山代闺人抒写怀远之情”吗？《木兰》是“托喻令狐”或“借木兰自喻”吗？《离思》是“向令狐陈情告哀”吗？《丹丘》之“凤凰”是指李德裕吗？《青陵台》是王氏死后，义山“负疚自谴”之作吗？《西溪》“末联凤女龙孙自指子女而言”吗？《过招国李家南园》之“新人”指昔时之“新人”王氏吗？《明神》是为李德裕鸣冤吗？《谒山》是“往谒令狐”吗？是“指登山而望景光流驶”吗？《归来》之“波浪眼”谓“水程”？谓“宦海波浪之眼”？王氏死于大中五年春夏之交吗？“卒前夫妇未及见面”吗？（以上问题见《李商隐诗歌集解》）至于李商隐之生平履历，如说他因婚于王氏而得罪令狐，他究竟是亲牛党还是亲李党，或是在两党中间的夹缝中求生存等重要问题，也有重新审视的必要。还有那神秘幽隐的爱情诗，如《燕台诗四首》、《柳枝五首》、《镜槛》、《蜂》、《圣女祠》、《重过圣女祠》、《李花》、《河阳诗》、《河内诗二首》、《碧城三首》、《当句有对》、《银河吹笙》、《碧瓦》、《拟意》、《可叹》、《昨日》、《明日》、《如有》、《即目》、《春雨》、《夜思》、《寄远》、《暮秋独游曲江》、《一片》（一片非烟）等等，难道比《无题》好懂吗？前人的笺注、今人的疏解都令人满意吗？《李商隐诗集今注》将对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“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”，力图对义山诗集作出比较准确合理而又通俗简明的解释，使专家学者览之不以为简陋，使广大诗歌爱好者读之不以为深奥，可谓化难为易，深入浅出者也。

二

有唐一代是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中最好的一个朝代，国力空前强大，经济、文化空前繁荣，各民族关系的融洽，中外文化的交流以及学术思想的自由，人性的解放，都胜过任何朝代。即使在安史乱后，唐帝国由盛转衰，逐渐走向没落，统治集团也并未因此而箝制信仰自由、学术思想自由，不像清朝那样专横暴虐。所以，当时文化知识界人士能以济苍生、安社稷为己任，揭露和批评各种弊政，敢于指斥朝廷，讽刺皇帝；而昧着良心为鬼为蜮、甘心舔痔、坚决当奴才的人是极少的，整个民族的精神品格、文化素质是好的。李商隐一生恃才傲物，抑塞于党祸，而新旧唐书本传所谓“放利偷合”、“诡薄无行”，并非实情。朱鹤龄笺本序曰：“吾观其活狱弘农，则忤廉察（开成四年，义山释褐为秘书省校书郎，调补弘农尉，以活狱触怒观察使孙简）；题诗《九日》，则忤政府（言令狐绹官贵，代表政府）；于刘蕡之斥，则抱痛巫咸（义山有《哭刘蕡》、《哭刘司户蕡》诗）；于乙卯之变，则衔冤晋石（言甘露之变，宰相王涯无辜族诛）；太和东讨，怀积骸成莽之悲（见《随师东》）；党项兴师，有穷兵祸胎之戒（见《汉南书事》）；以至《汉官》、《瑶池》、《华清》、《马嵬》诸作，无非讽方士为不经，警色荒之覆国，此其指事怀忠，郁纡激切，直可与曲江老人相视而笑，断不得以‘放利偷合’、‘诡薄无行’嗤摘之者也。”冯浩《玉溪生年谱》指出新旧唐书本传不合史实的地方有八九条之多，焉知其品评李义山的那些话定然属实？《旧唐书》为张昭远、贾纬、赵熙等人所撰，由刘昫、赵莹监修，因黄巢、朱温的起义及五代之乱，史书焚毁无数，晚唐诸传大都取材野史传闻，又大都出于牛李党人之手，各是其是，各非其非，持论偏颇，岂能尽信？《新唐书》为欧阳修、宋祁编修，虽于《旧唐书》有所补充，标榜“事增

于前，文省于旧”，但保存原始资料反不如旧书，书出不久，吴缜即撰《新唐书纠谬》二十卷举其八失。新书本传介绍义山生平略于旧书，而在令狐绹以为“背恩”之后，加上“放利偷合”的话，这也许就是深文周纳之功吧！

李商隐字义山，自号玉溪生、樊南生，怀州河内（今河南沁阳）人。生于唐宪宗元和八年（公元813年），卒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（公元858），一生经历了宪、穆、敬、文、武、宣六朝，正是史家所谓中晚唐时期。安史乱后的唐帝国，元气大伤，漏洞百出，与昔时相比，则不可同年而语矣！李唐王朝统治力量衰微，藩镇割据日趋严重，宦官掌握军政大权，决定皇帝的废立，官僚群体中又有排斥异己的宗派集团之间的争斗，即所谓“牛李党争”，势同水火，延至唐末，不少文人卷入这场斗争，深受其害。由于朝政腐败，对地方的失控，地主庄园经济迅速发展，土地兼并加剧，甚至公开进行吞并与掠夺，均田制已破坏殆尽，农民流离失所。代之而起的两税法弊端百出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。封建统治集团从中央到地方，普遍地荒淫奢侈，京都长安之外，洛阳、汴州、扬州、苏州、杭州、襄阳、荆州、鄂州、洪州、广州、成都等城市呈现出畸形的繁华，歌楼妓院，昼夜不歇，更助长了地主、贵族、大小官僚享乐的欲望。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”正是唐王朝崩溃之前的景象。

怎样的时代，就产生怎样的人物。李商隐一生的遭际遇，处处与他的时代密切相关，虽然他只是一个官不挂朝籍的小吏。他出生在一个已经没落的小官僚家庭，父亲李嗣做过获嘉县令，祖父李甫做过邢州录事参军，高曾祖也只担任过县令、县尉之职。他在《哭遂州萧侍郎》诗中说：“公先真帝子，我系本王孙。”自称与皇室同族。那是因为他的祖先李承在北魏太武帝时受封姑臧侯，又以本爵让给弟弟李茂，承、茂的曾祖是凉武昭王李暠，而唐高祖李渊是李暠的七代孙，所以李商隐确实与皇室同宗共祖。惟同源分流，迁徙异地，故属籍失编。从诗人的祖父开

始，李家由原籍怀州河内（沁阳）迁居荥阳（郑州），两地相距二百里，中间隔一条黄河。诗人三岁时，父亲罢去获嘉县令，往江南充任地方使府幕僚，“浙水东西，半纪漂泊”，举家随往浙江，诗人在江南度过六年童年生活，九岁或十岁时，父亲病故。“某年方就傅，家难旋臻，躬奉板舆，以引丹旌。四海无可归之地，九族无可倚之亲。既祔故邱，便同逋骇，生人穷困，闻见所无。”（《祭裴氏姊文》）他跟母亲扶柩回郑州，三年守丧毕，迁居洛阳。他“五年读经书，七年弄笔砚”，父歿之前已开始学习生活，父歿之后，在家乡跟堂叔学习古文、书法。这位堂叔学问渊深，曾在太学读书，其父曾为“郊社令”，父死，结庐守墓，遂誓终身不仕。“通五经，咸著别疏，遗略章句，总会指归，韬光不耀……注撰之暇，联为赋论歌诗，合数百首，莫不鼓吹经实，根本化源，味醇道正，词古义奥，自弱冠至于梦奠，未尝一为今体诗。小学通石鼓篆与钟蔡八分，正楷散隶，咸造其妙。”“商隐与仲弟羲叟、再从弟宣岳等亲授经典，教为文章，生徒之中，叨称达者。”（《请卢尚书撰故处士姑臧李某志文状》）在堂叔的教导和影响下，商隐十六岁著《才论》、《圣论》，以擅长古文与士大夫往来。大和三年三月，堂叔病逝。十一月，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聘李商隐为幕府巡官，当时他只有十七岁，尚未登第。“将军樽旁，一人衣白。”（《奠相国令狐公文》）可是令狐楚因为爱他的文才，深为礼遇，“人誉公怜，人谮公骂”，关系非同寻常。“每水槛花朝，菊亭雪夜，篇什率征于继和，杯觞曲赐其尽欢，委曲款言，绸缪顾遇。”（《上令狐相公状》一）令狐楚是牛僧孺党的重要人物，说他有意为牛党罗致人才，也很可能。他亲自教授商隐和令狐绹学做今体文，即当时流行的四六骈体文，这是做官的重要条件。大和六年二月，令狐楚调河东节度使。本年商隐“被乡曲所荐，入求京师”（《与陶进士书》），令狐楚“岁给资装”（《旧唐书》传），助其入京应考。《上崔华州书》说：“凡为进士者五年，始为故贾相国（餗）所憎，明年病

不试，又明年复为今崔宣州（郾）所不取。”此书上于开成二年正月初，两次应试失败，当是大和六年、八年的事。大和七年六月，令狐楚入京为吏部尚书，商隐回郑州，谒见郑州刺史萧澹，萧澹将他介绍给华州刺史崔戎，崔戎聘他为幕僚，接着送他“习业南山”（《安平公诗》）。明年应考不第，五月随崔戎自华州至兖州幕府。六月，崔戎病故，商隐西归，往来于河洛郑州之间。大和九年六月，崔戎逝世一周年，商隐由郑州至京城崔戎旧宅吊祭。十一月，发生甘露事变，这是宦官与朝廷（包括皇帝）的总较量。宰相李训、节度使郑注谋诛宦官，事败，训、注、王涯、舒元舆等皆被杀，族诛十余家，死者千余人。甘露事变给诗人以强烈的震撼，其《有感二首》专为此事而作，对朝臣遇害深表痛惋，对宦官的凶残表示极大愤慨。接着又作《重有感》赞赏刘从谏敢于揭露宦官仇士良等的罪恶和“誓以死清君侧”的正义行为，表现了对国家政治前途的关切和爱憎分明的感情。开成元年，他奉母迁居济源，到济源县西三十里的玉阳山学道教。玉阳山是王屋山支脉，山下有玉溪，“故山峨峨，玉溪在中”（《奠相国令狐公文》）。“义山未第时曾习业于王屋山的玉溪，说明他的学仙和习业原是同时事情。”（《李商隐评传》）所以商隐自号玉溪生。开成二年春，商隐考中进士，高锴为主考官。令狐绹当时在门下省为左补阙，高锴“见之于朝，揖曰：‘八郎之友，谁最善？’绹直进曰‘李商隐’者，三道而退，亦不为荐托之辞，故夏口（高锴出任鄂岳观察使，治所在夏口，即今武昌）与及第”（《与陶进士书》）。商隐在给友人的信中坦率地述及自己中进士，得力于令狐绹的推荐，此信作于任弘农尉时，已与绹关系破裂，但并不否认从前所得到的帮助。进士及第后，于暮春三月东归，向洛阳亲友报喜，回济源安排母亲的生活，到外地聚粮以解决吃饭问题，诸多事情需要亲自料理。令狐楚早在上一年四月调任兴元尹、山南西道节度使，曾聘商隐入幕，当时因奉母居济源，未赴镇。及第后，令狐楚又催促他人

幕，他答应“至中秋方遂专往”（《上令狐相公状》六）。入冬，令狐楚起病，商隐由长安匆匆驰赴兴元（今陕西南郑）。《莫相国令狐公文》说：“愚调京下，公病梁山，绝崖飞梁，山行一千。”他到镇时，令狐楚病已沉重，代楚草《遗表》，十二月扶楚丧回京。开成三年春，应博学宏词科试，考官周墀、李回已经录取他，复审时，有位中书长者说：“此人不堪。”被除名。冯浩《年谱》说：“中书长者，必令狐绹辈相厚之人。”非常正确。但是令狐绹既助他成进士，为何又通过中书长者毁之于宏博呢？学者多以为商隐婚于王氏，做了李党王茂元的女婿，因此得罪了令狐绹。冯浩说“应宏博正当初婚之际”。他们都以为商隐先结婚后应试。事实上，婚于王氏是应宏博以后的事，开成二年，不可能受泾原节度使王茂元之聘，故能受令狐楚之召赶往兴元，三年开春即准备应试，还要请当世显达为之延誉，不可能往泾幕求婚。他与令狐绹之间出现裂痕，应当在中进士之后、应宏博之前这段时间。商隐中进士后，立即写信给兴元尹、山南西道节度使令狐楚表示感激。“碎首糜躯，莫知其报效。”（《上令狐相公状》五）但他并不愿一辈子做幕僚，也不把朋党关系看得比君臣关系更重要，他一心想通过考试释褐做朝官，以摆脱白衣卑职和贫困处境。《樊南甲集序》曰：“十年京师寒且饿。人或曰：‘韩文、杜诗、彭阳（令狐楚）章檄、樊南穷冻。’”青年李商隐以挨冻受饿闻名京城。何况老母在堂，弟妹尚幼，作为长男，不得不负起养家的责任。在举家几乎断炊的情况下，他不得不到远处聚粮。令狐楚多次催他入幕，他不就职，却赶往京城谋事。直到令狐楚病重，他才匆匆驰往兴元。令狐楚能理解商隐的苦衷，而令狐绹则未必有其父的气量。令狐楚死后，商隐还要准备应宏博试，李党人物周墀、李回为试官，对他的文学才能颇为赏识，将他录取。朝中既非一党当权，商隐不可能不接触李党，并且向他们表现自己的才能。《上李相公状》说：“某尝因薄技，猥奉深知，麟角何成，牛心早啖。”他把自己受李回的深知，比作王羲

之受周颙的爱接。开成二年，他还为李党王茂元撰状文多起，如《为濮阳公上杨相公状》、《为濮阳公上华州陈相公状》、《为濮阳公上陈相公状》等，其时尚未入泾原幕，无非向达官贵要显示自己的才能。但是，他错了。错误不在于商隐多才，而在于向谁用才。令狐绹为人胸襟褊狭，对商隐不遵守党派戒律自然恼恨，视他为异己分子，故利用与己相厚的中书长者抹去其姓名。李商隐成了牛李党争的牺牲品。应宏博试失败后，商隐不得不另有依投，于是赴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，茂元爱其才，以女妻之。于是令狐绹找到了商隐背牛党李的铁证，嗤谪他“背恩”，尤恶其“无行”，后来牛党得势，商隐永无出头之日。唐代的朋党不同于今天的政党，不是基于经济的、政治思想的有严密组织、明确纲领的集团，只不过是政治人物们个人关系的网络。朋党的领袖们为了追求和扩大政治权力，往往拉拢那些想分润杯羹的追随者。所谓“牛李党争”是指以牛僧孺为首的官僚宗派同以李吉甫、李德裕父子为首的官僚宗派之间的权力斗争。自穆宗至宣宗朝，两派斗争将近四十年。牛党的领袖人物是牛僧孺、李宗闵、李逢吉，李党的领袖人物是李德裕、裴度、李绅。从两党重要人物的政治业绩和后代史家对他们的品评来看，李德裕比牛僧孺、李宗闵以及令狐父子要高出很多，岑仲勉甚至说“德裕无党”（《隋唐史》398页）。德裕的突出表现在武宗朝，武宗即位以后，首先打击牛党的杨嗣复和李珣；这两人是在文宗朝末年爬上宰相高位的。宦官仇士良要罢他们的官、杀他们的头，因为他们支持过武宗的弟弟和对手。李德裕在840年升任宰相，他不顾朋党利益，三次向皇帝陈词，挽救了政治对手的生命。他是一名极端精明干练的政治家，知识渊博，能言善辩，城府森严，精于算计。他把政敌牛僧孺、李宗闵从高层政治权力中排挤出去之后，对于特别过火的派性清洗活动不感兴趣。他能够协调大规模的政府行动，并且向皇帝提交设想复杂的建议。武宗迫使仇士良隐退后，不久仇士良死去，其心腹爪牙被清除。李德裕铲除了宦官的

各种权力基地，撤销了他们除神策军以外的其他兵权，使宦官不至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。他领导的抗击回鹘战争以及泽、潞等五州的平叛战争均获胜，顶住了外族入侵、方镇叛乱的危机。李德裕同武宗之间的关系处理得极好，以其特有的魅力赢得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神往。宣宗即位，起用牛党白敏中为平章事，务反会昌之政，武宗朝所贬牛党五相同日北迁；将李德裕一贬再贬，最后死于崖州。李商隐无论做地方幕僚还是在京城做九品官秘书省正字，都与牛李党争无直接关系。为了摆脱贫困，一行作吏，心怀躁进，接触过李党人物，在政治上对李德裕表示同情，却是事实。作为一个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，李商隐一生只有公心，没有派性，他为牛党的刘蕡而歌哭，为李党的李德裕、郑亚而歌哭，为了什么？为了正义！开成三年应宏博试落榜，明知吃了令狐绹的暗亏，却无力挽回这巨大的损失，终生的遗憾。他怀着满腔悲愤径往泾原幕府，登泾州城楼时，写作了《安定城楼》，说自己有贾生、王粲之悲，同时有“永忆江湖归白发，欲回天地入扁舟”的理想抱负，把猜忌自己的牛党权要比做鸱鸢、腐鼠，给予讽刺和蔑视。大约就在这一年夏天，商隐同王茂元的女儿结婚。王茂元是李德裕一派的武人，世代仕宦，大和九年由广州节度使改为泾原节度使。茂元有“七女五男”（《为外姑陇西郡君祭张氏女文》），商隐所娶是茂元最小的女儿。《祭张书记文》说：“维会昌元年，岁次辛酉，四月辛丑朔，二十日庚申，陇西公、荥阳郑某、陇西李某、安定张某、昌黎韩某、樊南李某，谨以清酌之奠，致祭于故朔方书记张五审礼之灵。”文中陇西公等六人加上张审礼共七人都是王茂元僚婿。“韩某”即韩偓之，诗中屡见；“樊南”，诗人自称。《韩同年新居饯韩西迎家室戏赠》云：“一名我漫居先甲，千骑君翻在上头。”韩瞻与商隐为同年进士，名次后于商隐，成婚于王氏却在商隐之前。杨柳《评传》说，两人各娶茂元的两个小女儿，而又均为继室李氏所出，故商隐与韩瞻关系最密切。

开成四年春，商隐至京师通过吏部试，释褐授官，做秘书省校书郎，秩位九品，但职官清要，可充翰林之选。因受牛党排挤，不久调为弘农（河南灵宝）尉，他将一名死囚改判活罪，触怒了观察使孙简，被罢官，正逢上姚合代孙简，要他还任。明年得河阳节度使李执方（王茂元妻李氏的兄弟）资助，移家长安。本年正月，文宗崩，武宗立，四月，李德裕同平章事。武宗会昌元年，辞去弘农尉，在华州（陕西华县）刺史周墀幕府。不久居王茂元陈许（河南淮阳）幕，为掌书记。二年春入京应吏部试，以书判拔萃，授秘书省正字。冬天，母亲病逝。商隐因居母丧去官，三年后才服阙入京复官。这期间，他为母亲、先辈戚属和夭亡的小侄女寄寄一共操办了五起葬事，几乎耗尽了仅有的微薄积蓄。会昌三年，王茂元调任河阳（河南沁阳）节度使，进讨刘稹之乱，中道而卒。四年春，杨弁之乱平定后，诗人离开长安，移家永乐，一方面是因为岳丈谢世，在长安没有依靠；另一方面，因为家中经济困难，移居乡村减少开支。远离喧闹的京都，过着隐居田园的生活，醉眠花下，展卷窗前，自栽草木，独赏岚光，十分惬意。但是唐朝不是晋朝，李商隐不同于阮籍、王羲之、陶渊明。晋朝人害怕做官，因为政治黑暗，做官很危险；唐朝人喜欢做官，因为有盛唐气象和中唐复兴给读书人带来希望，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朝廷，然而真正得到好处的却甚少。商隐不甘寂寞，积极用世的思想经常在胸中翻滚，其《春日寄怀》云：“世间荣落重逡巡，我独丘园坐四春。纵使有花兼有月，可堪无酒又无人。青袍似草年年定，白发如丝日日新。欲逐风波千万里，未知何路到龙津！”这种雄心壮志百无一遂的浩叹，令人怵魄惊心。会昌五年春，商隐应从叔李褒的招邀，到郑州、洛阳两地住了一段时间，代从叔撰写文章。十月，服丧期满，入京重官秘书省正字。会昌六年三月，武宗崩，宦官拥立皇太叔光王怡即位，改名李忱，是为宣宗。宣宗憎恶李德裕，四月罢为荆南节度使，九月以德裕为东都留守，同时大黜李党，大重牛党，武宗

朝被贬的牛党五相牛僧孺、李宗闵、崔珙、杨嗣复、李珣同日北迁。宣宗大中元年，宰相白敏中与宣宗一道全盘否定会昌之政，提倡佛教，增设冗员，朝政变得更加昏暗。贬给事中郑亚为桂州刺史、御史中丞、桂管防御观察使，贬德裕为潮州司马，李党人物纷纷外放。此时，李商隐被牛党视为叛逆，惶惶不可终日，于是受郑亚之聘，到桂幕任幕府支使兼掌书记。郑亚是荥阳人，元和十五年进士，“聪悟绝伦，文章秀发”，会昌初入朝为监察御史，迁刑部郎中、中丞，由李回推荐，任给事中。其时商隐为秘书省正字，与郑亚相知，故郑亚外调，特邀他人幕。郑亚给予商隐优厚的俸钱以维持家庭生活，解除其后顾之忧，同时给予他检校水部员外郎的京衔，为从六品上阶。这次远涉桂林，行程近五千里，简直是万里投荒。“明年赴辟下昭桂，东郊恸哭辞兄弟；韩公堆上跋马时，回望秦川树如荠。”（《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》）他在长安东郊与家人告别，心中是多么悲伤！三月初七动身，至五月初九到达桂幕，中经闰三月，花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，途中曾经历风波之险，“破帆坏桨荆江中”，险些丢掉性命。但郑亚对商隐非常信任和关心，说是同病相怜也可，说是患难之交也可，凡郑亚权限之内所能做到的，就尽一切力量为他帮忙。开始请商隐掌书记，很快擢为支使，其职位仅次于正、副观察使，还奏辟带六品京衔。士为知己者用，商隐在桂幕为郑亚撰写了许多表、奏、状、启等公文，对郑亚深表感激。其《海客》诗曰：“只应不惮牵牛妒，聊用支机石赠君。”言其不怕旧交令狐绹嫉妒，愿以自己的文采为郑亚效力。本年秋天，德裕被贬为东都留守后，将其会昌期间的奏议以及“册命典诰，军机羽檄”编成文集，请郑亚为之序，目的是为会昌政绩留下实录。商隐承担了此项任务，代郑亚撰写《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》，称德裕“成万古之良相，为一代之高士”。郑亚与荆南节度使郑肃同宗，称他为族叔，入冬，派商隐往使南郡（湖北江陵）。在奉使途中，商隐写了《自桂林奉使江陵途中感怀寄献尚书》一首五言